



了望西藏

了望西藏

总第 55期

西藏王统2139年

Tibet Observer

2013年 第1-2期

东海红龙“强娶”雪域白兔

——共产党的中国与佛国西藏



导 言

自1917年俄国共产党当权并建立苏联后，共产党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张旗鼓，并建立红色势力；此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在世界各地大搞“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1921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也是苏联主导的“国际共产”亲手建立的红色政党。共产党起初的政治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家阶级，最后消灭阶级并进入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贫穷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而言，很有鼓动力，推销“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市场潜力巨大。二战结束之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至空前壮大，拥有足以打垮中国政府军的武装力量。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处在冷战的状态中，敌对双方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专制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党制民主国家。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意味着苏联一方的共产主义阵营里多了一股力量。为了防止美英等西方势力翻越喜马拉雅山并向东扩展，苏联的战略计划是，先下手，置西藏于红色阵营的势力之中。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与西藏之间经历的“自始至终”略作叙述与分析；通过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和读者一起认识、了解中共与西藏和藏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与藏人最初的接触是怎么发生的？中共对西藏的看法和政策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有过西藏人自发的共产主义运动吗？中共为何要派兵占领西藏？西藏被中共统治以后发生了什么？并且正在发生些什么？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建立的。当初，中共的宗旨和原则大体上照搬了俄共和苏联的模式，视“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称自己为“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的民族政策观在早期也受到苏联的影响，主张“民族自决”和“建立联邦共和国”。

1920年4月，苏共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中国，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与李大钊会面，后经李大钊介绍前往上海见陈独秀，研讨建党问题。陈独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讨论建党的问题。

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直接帮助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与陈独秀一道帮助已解散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实现重建。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来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3日—31日，在共产国际特派员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张国焘等13名代表出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会上产生中共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在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1.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 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

政；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 联合第三国际。”

在纲领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基本性质，任务，目标。即，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家阶级”，“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目标是实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这里的“阶级斗争结束”或“社会阶级区分消除”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联合第三国际”显示了共产党在中国起初是共产国际策划并建立的政治属性。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是“自决”、“自治”、“民主自治邦”和“联邦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相关问题上，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里也同样指出：“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明确提出“承认民族自决”。在中共的“中央苏区”，通过立法形式把“民族自决”予以肯定。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指出，“主张民族自决，一直到弱小民族组织独立国家与政府为止”，“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各民族均具



共产国际特派员荷兰人马林



有“是否愿意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离而另外单独成立自己的国家”的单方决定权。“六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强调，“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早期的民族和国家观相当客观，把西藏、蒙古、新疆与中国本土区分而论，这是符合现实和历史实事。当时，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而蒙古大部也处于独立的状态，并且俄共和中共都在支持蒙古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共的楷模是苏共，而苏联



共产国际图标

是以俄国为主体的联邦制，它的性质是多国和多民族组成的“联邦共和国”；因此，建立一个苏联式的“中华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是中共的政治目标。以当时的世界和亚洲的政治局势，中共很清楚，除了西藏、蒙古和回疆（新疆）以外，中国周边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已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殖民，不可能联邦到它的“联邦共和国”中。比如：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被法国殖民，泰国、缅甸、不丹、尼泊尔和印度次大陆处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或被它殖民，中亚多国被苏联“联邦”。

二、中共跟西藏和藏人最初的接触

1933年10月起，中共中央和红军在中国南方的“苏区”遭到中国国民党政府军的全面围剿，损失惨重，为了避免全军覆灭，1934年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分别开始了后来被自称为“长征”或“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的向西北大逃亡。很显然，红军起初很茫然，没有既定的去处，但后来就决定北上去刘志丹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中共红军进入云南和四川等省的境内后，遭到当地政府军的封锁，无法直接北上。为了摆脱国民党政府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三大主力都曾先后从云南和四川闯入西

藏，从西藏康区东南部一路向北行军至西藏安多东南部，然后出西藏经中国甘肃抵达陕北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在“长征”期间“绕道”过西藏，是中国共产党与藏人之间的初次接触。

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和民间普遍称中共红军为“共匪”或“赤匪”，西藏安多和康区东部与中国四川、云南、甘肃接壤；当时，那里的部分地区甚至处在被中国侵占的政治困境下，所以，当中共红军逃到中藏边界一带时，对那里的西藏人而言，有关中共和红军是什么样的人和队伍，已有所耳闻。在西藏境内，那时的大体情况是，每当红军闯入藏人村庄、寺院、帐房时，就发现当地的农民、僧人、牧民都已跑到山里或树林里躲藏起来。中共红军宣称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工农子弟兵”、“穷人的队伍”、“穷苦人民的解放者”，所到之处，大兴“打土豪”，“没收寺庙、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从西藏人的村庄、寺院、帐房、地里和牧场，抢劫粮食、衣物、家畜等，甚至，许多藏人惨遭杀害。



当年中共红军经过美丽的若尔盖草原时，曾从藏人牧民手里抢走过牛羊。

据阿坝格尔登仁波切的证词，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期间进入西藏安多阿坝地区时，有两千多僧侣的黑水拉当寺被毁坏。在毛尔盖地区，许多藏人僧俗百姓遭受杀伤。中共红军占用毛尔盖大寺并在寺里召开“毛尔盖会议”。红军到嘉绒觉孜、姜觉、佳普、大仓寺等地时，抢夺了民众和寺院的财物和粮食，导致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饥荒，大批藏人饿死。嘉绒觉孜王和麦吾王，以及许多地方武装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自卫抗战，但最后，寡不敌众，藏人以失败告终。当时，阿坝格尔登寺的第34任堪布塔克的胞弟和恰才秃头为主的许多藏人遭杀害。位于嘉绒的格尔登母寺、查理寺、东日寺都遭到了严重的抢劫和毁坏。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军

队都驻扎在阿坝格尔登寺的大殿内，该寺的许多佛像和其他宗教信物被毁损，当地老百姓的财产和土地也遭到抢劫和占用。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红军一进入西藏境内，就第一次遇到了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藏人自然把闯入西藏境内的中共红军看作外来的入侵者，有些部落武装抵抗，不过，大部分部落和村庄的藏人带上粮食和家畜躲藏到森林和高山野岭中，红军每到一地，整个地区没有了人烟。红军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红军有枪，但是找不到敌人（藏人）。红军



“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塑像

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中共对其他民族的政策，没有机会结成友好的联盟！对红军而言，只有俘获了藏人以后才能找到向导引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上了朋友，出了西藏境界之后，许多向导继续参加“长征”。

当红军进入西藏时，展现在眼前的景象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里是这样描述的：“红军在大渡河以北爬上了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山顶向西望去，只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顶——西藏。”

西藏境内海拔高，地广人稀，对中共红军而言，身处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还要翻雪山过草地，需要搜集大量的口粮和衣物。

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红军当时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让一批藏人为他们当向导、通司（翻译）、壮丁。一些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和有些来自

贫困家庭的年青僧俗藏人相信红军说它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队伍”。一些上层社会的僧俗藏人听了中共红军说共产党提倡“民族平等”并会“帮助藏人赶走入侵西藏边区的国民党军阀”等宣传后，信以为真，支持和加入共军在当地组建“苏维埃博巴政府”和武装力量。一批被抓来和强征在红军里当向导、通司（翻译）的藏人青少年，也看到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后，随红军一起走完“长征”，成为最早加入了共产党的藏人。

扎喜旺徐、天宝（原名桑吉悦希）、五世格达活佛、肋巴佛金巴嘉木措等，是红军“长征”期间绕道经过西藏东部地区时，被中共统战而加入红军或与共产党合作，并在十几年后，成为中共军队“解放”西藏之时为共产党效劳过的“藏族干部”。

扎喜旺徐，生于1913年，西藏康区娘荣宗（今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牧区人，小时候为自家和富人家放过牛羊，后来离开娘荣老家，到甘孜一带打工谋生。1935年初，徐向前、陈昌浩带领的红四方面军闯入甘孜地区，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局势十分紧张，惊恐万分的当地藏人僧俗官民，纷纷逃到深山老林或边远地区去避难。据说，扎喜旺徐当时没有跑，他后来告诉人，他为什么没有跑？当时他想：天上的乌鸦没有人打。为什么？因为肉不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什么？

当时，邵式平给了扎喜旺徐一件衬衣和一块红布条，让他把红布条挂在胸前。但扎喜旺徐并不知道那块红布条是“代表证”，上面写着“民族代表”4个字。扎喜旺徐后来才知道，红军当时想在甘孜开会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他们村子没有人愿意参加会议，就让他当了代表。在谈到这件事时，扎喜旺徐总是风趣地讲：“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

邵式平和部下见扎喜旺徐是个“穷人”，说红军是“全世界穷苦人的队伍”，说服他参加红军后，立即派他去把躲藏在深山老林里的藏人僧俗百姓和被他们埋藏的粮食找回来。扎喜旺徐很快找到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把红军的宣传材料给他。当时，红军对藏人说，它是全世界劳苦群众自己的军队，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红军北上抗日，而国民党“卖国”政府不但阻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抗日，而且动用重兵切断了红军在中国境内北上抗日的行军路线，所以，红军在北上抗日的路上，只好绕道经过西藏。

1936年5月5日，红军在西藏甘孜成立了“甘孜博巴政府”。邵式平任博巴政府主席，夏克刀



扎喜旺徐、天宝等中共红军里的藏人小兵在中国陕北

登、格达活佛等人任副主席。扎喜旺徐被任命为骑兵团连长。1936年7月2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孜，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邵式平把扎喜旺徐派到红二方面军，为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质。后来，扎喜旺徐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中国陕西。

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对西藏的认识是相当客观的。根据西藏的过去和现状，尤其是中共红军有了在“长征”途中为了逃过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绕道经过西藏东部的亲身经历之后，不但认识到西藏不同于中国“本部”，而且是一个与中国不同的外国。《红星照耀中国》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到：“（如果）不抢（藏人的粮食和家畜）（红军）就没有吃的，因此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

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西藏人的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据毛泽东说，萝卜大得可以一个够十五个人吃。他们就是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斯诺还写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西藏人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其实，进入西藏境内之前，红军也在贵州、云南和四川等地经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用同样的手段“拿”走了不少“给养”，但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说从藏人那里“拿”走的“给养”是“唯一的外债”，原因就是中共红军亲身经过西藏东部地区时，亲眼目睹了西藏是一个外国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毛说西藏是外国，说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起码在这一点上持的是尊重事实，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实事求是的原则。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少数民族问题”一节中，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和赞扬共产党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正确”政策时，是针对两个党对“蒙族”、“新疆的少数民族”、“回族”的政策而言的；根本没有提到西藏或藏族。很显然，中国共产党把西藏依然看作是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三、西藏共产党与平措汪杰

1939年至1949年，平措汪杰（平汪）与一些藏人一起曾先后组建“雪域藏人共产主义革命小组”、“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星火社”、“雪域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西藏共产党）、“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东藏人民自治同盟”、“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等共产主义组织。平措汪杰主导的在西藏的共产主义互动，可以说是他和一些在思想上受马列主义观点影响的西藏青年人自发的政治运动。他们的确觉得马列主义是挽救西藏的“灵丹妙药”，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民主进步、统一而不被外国势力宰割的西藏”。西藏共产党在其近十年的存在期间，平汪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很活跃，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局限性，西藏共产党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势力，因此它对西藏民间和政府的影响力不大。

平措汪杰，生于1922年，西藏康区巴塘人，1935年，跟随舅父来到中国南京；1938年，他在重庆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其间他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他特别认同列宁《论民族自决权》的观点；1939年，平汪和根曲扎西、昂旺格桑、喜饶、马甲顿珠等在那里读书的藏人同学组成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平汪任书记。

1940年初，平措汪杰领导蒙藏学校学生闹学潮，抗议中国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遭到蒋介石以校长身份训斥后，平汪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学校当局开除。

1942年，平汪在康区东部重镇达哲多（康定）与昂旺、刀登、扎堆、曾却扎等人一起组建“星火社”。（193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在金沙江以东的西藏康区失地设立“西康”省，设“省会”于康定。）1943年，“星火社”在德格江东的活动被国民党军方发现，平汪与刀登渡过金沙江，从中国占领的德格江东地区逃入西藏政府管辖的德格江西地区。他们到达昌都后受到西藏噶厦政府康区总督宇妥·扎西顿珠的欢迎。

1943年冬，平汪和刀登在拉萨牟如寺曲巴冈，决定将原有组织改建为“雪域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后被称为“西藏共产党”），以“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改革”为当时主要的活动任务。在此期间，他们组建“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基本纲领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复失地；在西藏内部实施民主改革。参加者有：平汪、真东·多觉旺秋、洛杰·洛桑朗吉、昂旺格桑、刀登、澎涛、益西曲批、阿多、车列尼玛、巴瓦曾却扎、德格扎堆、宗喀喜饶、拉卜楞根曲扎西、结塘多吉等。

平汪和昂旺代表同盟会，会见了西藏噶厦政府的索康噶伦（大臣），向他阐述了世界大战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和趋势；分析了西藏目前被东西帝国主义

势力霸占并宰割的局势，以及整个西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平汪他们向噶厦提交了一份意见书，建议西藏噶厦政府立即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社会等制度全面改革，并且支持在西藏东部安多和康区展开人民武装斗争，将中国国民党军阀势力驱逐出被占领土，建设一个政治民主、团结平等、领土完整的西藏。

当时，噶伦索康表示，他本人理解和赞同“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的主张，但须说服、开导西藏政府里那些思想保守的噶伦。噶厦对同盟会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

1944年，平汪和昂旺前往印度，秘密与印共建立联系，在噶伦堡会见印共在当地的负责人觉底士医生，在加尔各答与印共中央代表乔底巴苏会面。通过印共协助，平汪本来想去苏联与苏共直接建立联系，但赴苏计划未成，便返回西藏。不久，平汪等人于1945年在康区举宗（今并入云南省的西藏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组建“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准备在金沙江流域两岸的西藏东部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夺回失地。

1946年，“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准备在阿墩子举行暴动，暴动前夕，计划被泄漏，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恭布次仁（海

正涛）被杀害。平汪、昂旺、益西曲批等人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平汪和昂旺格桑作为起义的两个主要组织者，被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军统以“共党分子”正式下令四处张贴告示通缉。

1948年平汪又经昌都辗转到拉萨，他以拉萨小学音乐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各种“地下革命”活动。除了与原来在拉萨的“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同僚一起活动外，还结识了绕西·彭措扎西、格西曲扎、雪康·士登尼玛、崇本阿珠等上层人士。

1949年7月，平汪和刀登因涉嫌“中共秘密工



平汪和昂旺在印度噶伦堡，1944年。

人员”，被噶厦政府驱逐出境。他被武装押送经亚东出藏。平汪对宣读噶厦政府驱逐令的两位僧俗官员说：“拉萨是我们全体藏人的拉萨，不只是你们僧俗贵族的拉萨，你们今天可以强令我们离开，明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同年9月，平汪等人经印度，来到中国昆明，



平措汪杰（前排左起一）和一批西藏共产党人士，1947年。

并与当地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中共有关组织把平汪和他手下的其他西藏共产党员一律转为中共党员。之后，派平汪秘密回到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巴塘，组织“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即：“巴塘地下党”），任工委书记，发展了一批藏人中共党员。

与此同时，建立“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简称：“东藏民青”），平汪兼任总书记。当时，他们计划在西藏康区东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解放区”。后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向中共军队投降。这一带十几年前被中国国民党军阀侵占的西藏东部地区此时又被中国共产党军队侵占。

很清楚，平汪他们先后组建的组织中，“雪域藏人共产主义革命小组”、“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星火社”、“雪域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西藏共产党）、“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等是西藏共产

党自己组建的组织，而“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则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的。

总之，西藏噶厦政府不但不接受西藏共产党提出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意见，而且把平汪等人当做“中共秘密工作人员”而驱逐出境的做法，显然成了平汪和他的同僚们投靠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因素。平汪和同僚们从西藏共产党员转变为中共共产党员，也标志着西藏共产党以失败告终。

四、中共建政后出兵西藏的政治背景

中共在陕北的“红色苏区”期间，得到了多年扩军休养，壮大势力的机会；1945年日本战败时，苏联红军把在满洲缴获的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军队，其数量为：步枪约70万支，轻重机枪12000—14000挺，火炮约400门，坦克装甲车辆约600辆，飞机800架，汽车约2000辆。再之，二战一结束，世界格局立即变为两个对立面：一方是以苏联带头的共产主义集权集团，而另一方则以美国为首的民主法制国家。在苏联的直接和间接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向亲美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发动战争，共军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这场内战称做“解放战争”，后来的三年里，苏联在武器装备等方面继续



一幅上世纪50年代的中共宣传画，斯大林画得比毛泽东高大许多，画中还写有：斯大林是我们伟大的导师和亲爱的父亲。

支援中共。由于各种因素，共军打赢了这场战争，而国民党的原中国政府和国军残部则退至台湾岛。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家。11月上旬，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苏。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动身前往莫斯科。对毛而言，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跟苏联签订一系列新的条约，废除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其中包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晤的宣传画

括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斯大林而言，利用中国共产党，在亚洲扩大“苏维埃”的世界，其中包括把佛国西藏纳入到红色政权的版图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中，毛泽东受命于斯大林，从列车上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部署“进军西藏”。

在莫斯科，毛和斯大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几个星期过去后，商谈毫无进展。是否向西藏出兵的问题是其中的分歧之一。斯大林觉得苏联和中国在西藏的影响力不如美国和英国，为了消除美英在西藏的影响力并把西藏纳入苏联的红色阵营中，他下令毛泽东立即出兵占领西藏，毛不敢拒绝斯大林，但他不愿意急着出兵西藏，毛的主要顾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未得到印度、英国等国家的承认，如果他出兵入侵西藏，他担心这些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将不会承认他的“新中国”。

在毛泽东得知印度等国家已决定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1950年1月2日，他从苏联发出“关于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的电报，对于出兵西藏的原因，他丝毫不做掩盖地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正是历史事实，中共当初在苏共的指示下出兵占领西藏，就是因为西藏的国际地位极其重要的原因，而不是今天中国政府所高喊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毛说占领后将把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就是在仿效苏共，就像“人民民主的波兰”、“人民民主的蒙古”、“人民民主的朝

鲜”、“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将把纳入红色版图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造成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红色“党国”并称其为“人民民主的国家”。

五、毛下令出兵西藏，斯大林立马签署多项条约

1950年1月10日，毛从苏联给北京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实质上是出兵入侵西藏的正式指令。毛好不容易等到英国、印度等国家正式承认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基本上消除了以前的顾虑，毛也清楚，出兵西藏有利于促使斯大林尽快与他签订条约。毛在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是有利的。”他指示中共有关部队的领导，开始进军西藏的行动，“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地区”。毛在电报中强调，“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



图为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后排左一为斯大林、左二为毛泽东。

关”，他命令西南局，立即拟定这个党政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这里所指的“康藏交界地区”是指西藏康区金沙江和澜沧江两岸的部分地区。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军政部门迅速做好了出兵西藏的部署，决定西南军区的第18军担任入侵西藏的主力部队，西北军区以骑兵支队，云南

军区以14军44师126团，新疆以独立骑兵师配合进藏。

西南局于1月18日上报并经中共中央1月24日批准，设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为“统一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



1950年中共政府发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纪念邮票

宝为委员。其中，天宝，原名木尔加·桑吉悦希，西藏嘉荣措定地区（今划入四川省的西藏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人，1935年，红军长征“绕道”西藏东部地区时，跟随红军并成为共产党员的西藏人。

在正式下令进军西藏，并完成出兵西藏的部署后，毛也相信斯大林和他签约的时间也不会太久。2月14日，毛来莫斯科快到两个月之时，斯大林和



中共第十八军“进藏动员大会”一角

他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条约。2月15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2野战军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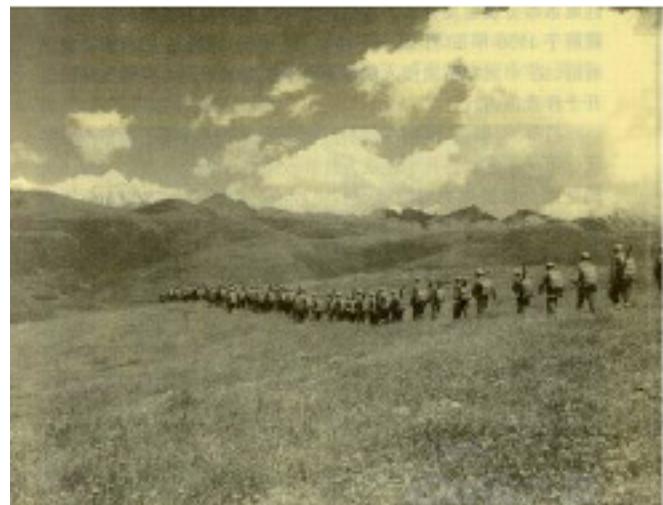
为了尽快占领西藏，中共派遣军队入藏的同时，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通过诱导和威胁并用的手段，对西藏噶厦政府官员、地方官员、部落首领、宗教领袖、及僧俗百姓，展开了劝降和统战工作。中共从已被占领的西藏安多地区和康区东部选派一些藏人去拉萨，劝说拉萨的西藏政府投降。

1950年1月底，中共中央和“青海省”有关部门派藏人张竞成等4人去拉萨，带信给达赖喇嘛和达札摄政。2月，西南局派中国人志清法师去西藏劝降西藏政府；4月，中共政府还通过它在驻印度的大使馆找到当时在印度的西藏噶厦政府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要他们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



中共第十八军在金沙江东岸的西藏康区

土”、“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前提下，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同年5月，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去拉萨，达赖喇嘛尊者的长兄安多塔尔寺的当才仁波切晋美诺布被任命为“团长”，安多隆务寺夏日仓活佛为“副团长”、大通县先灵活佛为成员，迟玉锐为“随团秘书”。实际上，迟玉锐



中共军队在西藏东部康区境内行军



中共军队在西藏境内强征大批的牦牛、骡马和人员用于军需物资运输和当向导。

上图：从被俘的藏军手里缴获武器；
中间和下图：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藏军，其中的西方人福特是西藏政府雇用的公务员中唯一的外国人。

是这个团的真正的头儿，他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派来的特务，三位藏人活佛，实际上是处在迟玉锐和他手下四个人的监督和押解下。当“代表团”在聂荣宗境内被西藏政府阻挡，三位活佛被护送至拉萨，而迟玉锐等4人被押解到山南泽当软禁，他们携带的电台被没收。7月，中共派康区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去劝降西藏政府，但他在昌都去世而未能前往拉萨。格达活佛全名格达·洛桑丹增，当时



贺龙元帅在检查中共十八军的武器装备

他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早在中共红军“长征”绕道西藏东部地区时，被中共统战。7月中旬和8月上旬，中共侵藏部队前线指挥官给当时在昌都的噶伦拉鲁·次旺多吉和驻生达的藏军代本牟暇写信，要他们向中共投降，威胁说，要他们“成为效劳于国家和人民的功臣，而不要成为背叛国家出卖人民的罪人”，“不要听信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欢迎和帮助解放军，共同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让西藏人民永远享受自由幸福。”

在过去两百年间，西藏基本上处在被外强欺凌的状态中，西藏的国土不断地被外国列强以各种形式宰割。安多地区和康区西北部及金沙江以东的西藏领土或多或少已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这些沦陷的西藏地区有些是被满清帝国侵占，而有些则是被中国国民党军阀侵占。1950年，当中共派兵入侵西藏之时，首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这些地处西藏门户的东部地区，而西藏中央政府能做的也只是隔河观火而已。安多地区和康区东部和西北部许多地方的西藏僧俗百姓拿起土枪和鸟朵（赶牛羊用的抛石器），奋起抗击中共军队的入侵，但中共军队凭借大炮、步枪和机枪，一路杀戮，长驱直入到有西藏中央政府派兵驻守的康区西部地区。

1950年10月6日，中共侵藏军队向西藏康区西部重镇昌都发起强大的攻击。中、藏两军的兵力

强弱极其显著，中共军队，武器战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人数为40000多（另一说是20000多）；而西藏守军，则武器战备极差、没有战斗经验、人数只有8000多。两军先后打了20多仗后，10月19日，昌都沦陷；同日，噶厦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於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10月24日，多康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在竹各寺向中共军队投降。对此，中共是这样记载的：“昌都战役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1950年底，中共在昌都设立“解放西藏委员会”，王其梅任主任，昌都寺的帕巴拉活佛、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活佛罗登协绕、大商人邦达多杰、降央白姆、平措汪杰、惠毅然、格桑旺堆等



投降后的原西藏政府噶伦兼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低头哈腰并用双手握着中共十八军副政委兼“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的手。

被任命为副主任。中共政府把通过诱导和软硬兼施的手段统战过来的一些占领区政教界的上层人士和被俘的藏军军官在其军政机构中予以任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削弱西藏民间的抵抗运动及分化西藏政府上层内部。

昌都沦陷后，西藏的形势非常危机，中共的大军分多路逼近拉萨，昌都战役使西藏原本就不强大的兵力更弱，如果藏军想继续阻挡中共军队已是不

可能了。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俗百姓的要求下，摄政达扎活佛被迫辞职，年仅16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提前于1950年11月14日正式亲政，处理政教事务。

六、中藏协议和西藏丧失主权

1951年初，在击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之后，中共解放军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继续推进。大军压境，拉萨的情况非常紧急。根据乃琼护法神“达赖喇嘛尊者出走拉萨为上策”的旨意，



阿沛·阿旺晋美抵达北京火车站时受到中共总理周恩来的迎接

达赖喇嘛同40多名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员向南而行，驻扎在离印度边界不远的亚东镇，一时，亚东自然成为西藏政府的临时首都。南行亚东之前，达赖喇嘛任命大堪布罗桑扎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伦，在拉萨代理政务。

1951年3月，西藏噶厦政府的5名代表去北京谈判。其中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三人由陆路赴北京，1951年4月22日傍晚到达北京火车站时，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前往迎接。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俩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去北京，4月26日，他们抵达北京，周恩来和朱德等同样前来迎接。

中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时任中共政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其余成员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解放军西南区参谋长张经武，18军军长兼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周恩来还指定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藏人平措汪

杰和18军宣传部长乐于泓两个人为列席代表。谈判期间，周恩来再次亲自点将，要平措汪杰担任此次谈判的政治翻译。

西藏噶厦政府的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布（政府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藏汉语翻译彭措扎西、英文翻译桑都仁青。

在中藏双方的谈判代表中，阿沛·阿旺晋美的身份最为奇特，他原来是西藏政府的噶伦兼多康总督，但在昌都战役中，战败并向中共解放军投降；昌都沦陷后，中国共军设立“昌都解放委员会”，任命阿沛为副主任。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共“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摇身一变，成为西藏政府一方的首席代表。总之，阿沛·阿旺晋美此后在政治生涯中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与绝大多数中共体制内当官的人不同，在“文化大革命”和其它众多的政治运动和斗争中，他一直没有受到批斗或坐牢之苦，从1952年到2009年去世为止，阿沛在中共政府里先后担任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藏中谈判于4月29日正式开始。谈判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周在宴会上以命令的口吻说：“这次谈判要依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来进行。这是十条公约，大家要共同遵守。”

先看一下中共政府方面提出的“十项条件”的来历和内容：

195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的战略方针，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强求西藏政府和人民承认其中提出的四项条件。四项条件为：（一）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的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后来邓小平和中共有关人士在“四项条件”上加项添字后成为“十项条件”或“十大政策”。其内容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

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



中国共产党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的谈判代表团在中国北京

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维持任职，不咎既往。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政策。

谈判中，中国代表要西藏代表承认中方提出的条件，针对中方的“十项条件”，藏方代表提出了西藏噶厦政府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其基本内容为：1. 你们称进军西藏是

西藏是为了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但是，西藏没有处在英美的霸权之下。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13世达赖出走后延续下来的，同美国只是商务关系。2. 请归还旧中国政府占领及现在解放军占领的西藏地区。3. 如果外国入侵西藏，再请中国政府协助。4. 请撤走已进驻西藏康巴和阿里中国军

队，因为西藏粮食产量不多，来这样多队伍会影响人民的生活。5. 有些站在中方的人，为了私人利益，曾挑拨汉藏关系。因此，为了改善汉藏关系，使汉藏和睦相处，今后请勿听谣言。

藏中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仍毫无进展，主要

问题是，中方要藏方代表承认中方的一切条件，而不承认藏方提出的五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中方首席代表李维汉态度非常专横，他以战胜者的姿态，在和谈期

间多次大发脾气，教训西藏代表说：“进军西藏，解放和保卫边疆，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从噶厦的五个条件看，西藏上层部分人有三点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仍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延以观国际形势变幻；三是怀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不对，要整，打败了整更容易，何须谈判？”

僵持了近一个月后，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西藏谈判代表于4月23日被迫签署了中方拟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份“协议”是中方在西南局的“十项条件”为基础之上拟定的，内容包括“17项条件”，故通常称之为“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内容：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



西藏代表们在“十七条协议”上“签字”

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以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七、实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以变更。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九、依据西



“十七条协议”签署完毕的当天晚上，中共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庆祝；餐桌上，毛（右一）在大谈阔论，阿沛在一旁洗耳恭听。当时，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政府还不知道协议已“达成”的情况。

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

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将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它日用品。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签字的第二天晚上，中共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协议》的签署。中共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北京各界知名人士180余人出席作陪。

1951年4月29日到5月23日，经过二十多轮协商，最终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条约是中方单独拟定，签署之前也不让西藏代表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通报有关谈判的情况，甚至协议上所盖的西藏政府的公章也是中方临时在北京刻制。谈判之前，西藏方面的代表是以西藏噶厦政府的代表身份去中国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谈判，而和谈之后，中国政府变成“中央政府”，西藏政府则降低为“地方政府”。就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西藏古国，不但未能收复此前被外国列强侵占的大片领土，而且全国沦陷，丧失主权。当西藏谈判代表被迫在“协议”上签字并盖以假章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

称“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之时，西藏政府还不知道，中藏之间已“达成”了“协议”。

达赖喇嘛在自传中写道，“我和我的政府根本没有被告知和谈协议已达成之事。”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的官员们后来才从收音机里听到阿沛在北京的广播电台里谈协议已达成的事；起初，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毛泽东知道如果西藏弄到手，最终得益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毛自己。斯大林急着要毛占领西藏，看重的是西藏的战略地位，就是为了扩张苏联为老大的红色阵线的势力，有利于阻截美英等民主国家的势力范围。西藏对毛泽东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只要占领了西藏，并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使西藏成为红色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扩大了真正意

义上的国土。总之，毛和中共政府通过自己在军事上的强势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利用世界处在冷战中的天机，侵占了西藏。

七、红色政权席卷西藏

“十七条协议”刚签订，北京便立即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经香港、印度，到西藏的亚东去会晤达赖喇嘛，然后进驻拉



中共军队以“主人”的姿态进入拉萨城

萨。行前，毛泽东还把张经武召到丰泽园训话。毛最担心的是，达赖喇嘛从亚东出走西藏，并在国际社会上进行政治投诉，要张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使达赖喇嘛尽早返回拉萨，千万要避免发生“因达赖出走而造成复杂局势”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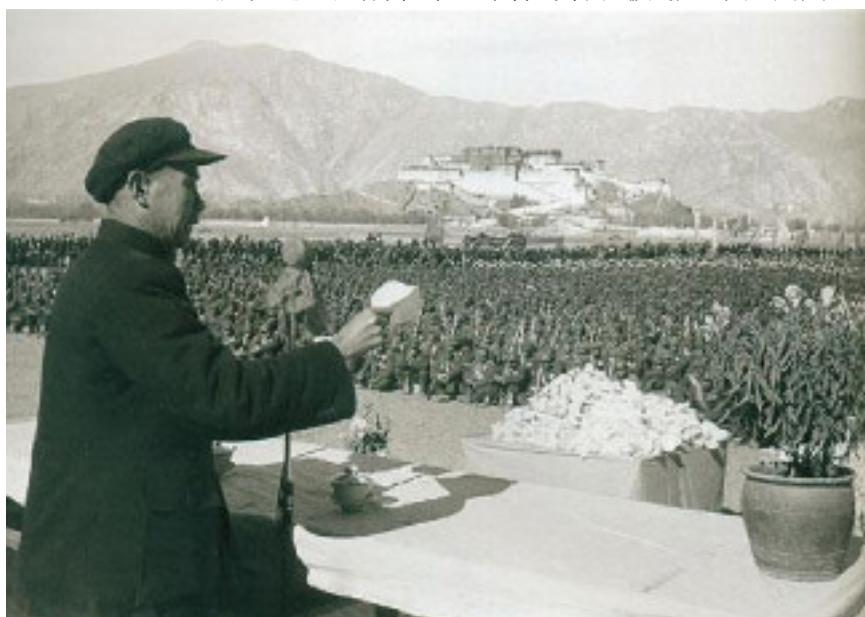
1951年7月14日，张经武一行到达亚东的仁青岗。16日，达赖喇嘛在离亚东十余里外的东噶寺会见张经武。

与达赖喇嘛会晤时，张经武说只要达赖喇嘛能返回拉萨，他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共政府和军方，充分保障西藏人管理西藏的自治制度，担保“十七条协议”中西藏现有制度不变的有关承诺。达赖喇嘛经过与随从的噶厦内阁官员商议，先同意返回拉萨。张经武还以威胁的口吻要达赖喇嘛承认“十七条协议”，不过，达赖喇嘛当时还没有表示承认“十七条协议”。

1951年6月7日，中共西北局设

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范明任书记，慕生忠等为委员。这之前，西南局早在1950年1月设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这样就产生了两个“西藏工作委员会”，他们各自为了在西藏称霸，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他们甚至提出将西藏分治，张在拉萨管理“前藏”和范在日喀则管理“后藏”的建议。为了保障中共政府有效统治西藏的总体利益，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10日把西南局和西北局的两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合编，张国华任书记，范明任副书记。。

1951年5月6日，中共的新疆独立骑兵师从于田向西藏阿里发兵，该师第2团先遣支队400人于5月28日到阿里的达扎麻芒保，与先遣连会师，并与7月27日到达阿里首府噶尔。7月25日，第18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先遣支队400余人由昌都出发，经边坝、嘉黎、太昭，于9月9日进抵拉萨。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第18军军部和主力抵达拉萨。从云南进藏的第14军第42师第126团一部共600人，于8月30日抵达竹瓦根。之后，团长高建兴率一部于10月1日进至察隅，该团另一部于10日抵达科麦，25日进驻沙马。第18军第52师第154团于11月23日抵达日喀则，28日进驻江孜。11月27日，由支队长范明、政委慕生忠带领的中共西北局派来的独立支队1000余人抵达拉萨。各路中共入藏军队从进入西藏东部（即青海省和被划入中国四川、



1951年12月20日，张经武在中共各路入藏军队在西藏拉萨的“会师大会”上讲话。



1952年2月11日，中共军队在拉萨的孜仲林卡举行“西藏军区成立大会”。

云南、甘肃省的西藏地区）到各自所在“西藏”的目的地，一路上强征牦牛、马匹、苦差等。对不配合和不服从中共军队的藏人僧俗百姓，以“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及造福西藏人民”名义，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和杀害。中共军队以相当快的速度，先后进驻了西藏与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接壤的各边防重地。

为了加快全面统治西藏的步伐，不久，中共中央在西藏设立“中央西藏工委”，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在工委九成员中，平措汪杰是唯一的藏人。1952年2月10日，中共正式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而后，中央任命赴藏代表张经武兼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



左起：赤列的钦、德木活佛、平措汪杰、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等在拉萨，1952年9月。

在“十七条协议”中有明文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和“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表面看来，西藏还没有搞“民主改革”，噶厦政府尚存在，达赖喇嘛尊者仍然是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中共的“中央西藏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在逐步插手噶厦政府的日常工作，指手画脚。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等人通常以下命令的口吻与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说话，这些做法激起了西藏人对中共官员的普遍不满和反感。中共在西藏的官员内部不和，张国华的西南区和范明的西北局两个势力一直明争暗斗，他们甚至试图制造和激发拉萨的西藏政府和在日喀则札什伦布寺之间的矛盾；一些



“西藏军区成立大会”上，张国华、
张经武等军官检阅军队。

西藏政府的高官和贵族也分别被“张派”和“范派”统战和利用。

中共入藏军队人数众多，张经武要求西藏政府借青稞2000吨给中国军队，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因海拔高，本来粮食产量就有限，西藏政府的存粮远远不够，为了凑足这个数字，达赖喇嘛和噶厦从寺院和私人手里借粮。除了粮食，还需要提供其它食物和物资。一时间，拉萨市内物资紧缺，物价高涨，民怨四起。不久，张经武等中共军官又要求西藏政府拿出2000吨青稞，使情况更是雪上加霜。西藏民众在拉萨成立人民会议，举行示威游行并向西藏噶厦政府和中共在拉萨的“中央西藏工委”提交请

愿书，要求人民解放军大部或全部从西藏撤走。

张经武将军一到拉萨，就急着要把藏军编入解放军中，罗桑扎喜和鲁康娃两个噶伦不同意，张与鲁康娃之间在相关政事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为了与中共能和睦共处而创造条件，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按张经武等中共方面的要求，撤了罗桑扎喜和鲁康娃的司伦职务，并解散了人民会议。

1954年，中共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和参观



达赖喇嘛尊者（右一）、班禅喇嘛（左一）和毛泽东（左二）在北京。

北京等中国的多个城市。当时，北京要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说西藏有10个参会代表名额，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此会，要求他当西藏代表团团长，并要他任命其他参会代表。许多藏人觉得达赖喇嘛当中共的人民代表很不妥，甚至有损于达赖喇嘛的尊严，并反对达赖喇嘛去北京。但是，对此达赖喇嘛在《我的故土和我的人民》中写到，“以我看，拒绝（去北京和参加会议）将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收获。相反，如果我们拒绝了，我们所拥有的自治的机会也将会失去”。达赖喇嘛觉得“我必须会晤中共当局的最高层，这样可以努力使中共政府和军方实践他们在‘协议’中所做的承诺”。

当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等抵达北京火车站时，受到总理周恩来、副主席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迎接。当晚，朱德设宴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洗尘，朱在讲话中说，西藏人民返回祖国的怀抱里了，中央人民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西藏人民。

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南

海与达赖喇嘛会晤时说，他很高兴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并且要求达赖喇嘛答应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晤时，毛说，佛教是一个相当好的宗教，佛本身是位王子，但是，他着想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问题。毛还说，度母是一位好心肠的女性。毛说可以取消成立“军政委员会”来管理西藏的计划，但目前他们的计划是设立“西藏自治区筹建委员会”，并问达赖喇嘛对此有什么看法。

达赖喇嘛觉得事关重大，他对毛说，在没有跟班禅喇嘛在内的其他藏人商讨之前，他不想就此事表态。有一次，毛邀请达赖喇嘛到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议，与会的有20多名中共高层官员，会议的议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标准”，在会上，毛说党的各级干部为老百姓做的事远远不够，他引用从湖南老家农村来信中的词语，批评共产党干部没能做到为广大群众应该做到的事情。而后，他转向达赖喇嘛，以很诚恳的口气说，西藏人的思想坚强或者倔强，20年以后西藏将会强大。

现在中国帮助西藏，但是20年之后，西藏可以帮助中国。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来北京之际，中共当局为了让他们“目睹和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的“伟大成就”，安排他们参观中国本土的一些“模范”城市、工厂、农场、水电站等等。后来，达赖喇嘛说，当时他真觉得共产党政府不错，他开玩笑地说，听说和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后，觉得自己已变成“半个马克思



1952年2月24日藏历新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

斯主义者”并很想加入共产党。当达赖喇嘛快要离开中国返回西藏之时，毛泽东邀请他到毛的中南海住处会晤。达赖喇嘛向毛叙述了这次他在中国的多个省份参观时耳闻目睹的建设项目和感想。接下来，毛泽东开始了冗长的训话，向达赖喇嘛讲授“民主的真正性质”，指导他“怎么当一个人民的好领袖”，“如何要听取群众的意见”等。最后，毛把头凑过来，轻轻地对达赖喇嘛说：“我很理解你。不过当然了，宗教是毒品！它有两大危害：它会使一个民族变的软弱；它会使一个国家的发展处在瘫痪状态。西藏和蒙古都受了其毒。”

至此，中共已完成了出兵西藏、占领西藏、并把西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等三个战略任务。毛和中共中央接着要做的事是，继续削弱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权利，在政治上达到党中央完全控制西藏，然后在西藏进行全盘“民主改革”。

八、强行“民改”，民不聊生； 战火四起，血染雪域

1955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已划入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的西藏康区大部和安多地区强制实行“民主改革”。早在1952年开始，中共政府在这些地方建制设县，为了取得西藏人的信任，也为了顺利在西藏东部地区建立中共统治之下的行政制度，当局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尊重西藏民族意愿”的政党，把统战工作作为主要手段，让当地的部落首领和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在县、乡等政府担任县长、副县长、乡长等职务。

到1955年时，中国当局认为这些地区的方方面面都已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这些地方也没有包括在受“十七条协议”制约的“西藏地区”内，中共中央就决定在这些地方进行改革。同时也可观察受“协议”制约地区藏人的反应。“民主改革”伊始，中共政府宣称，这些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是“同为藏族聚居区但属于不同行政区域而采取的重要决策”，“而西藏地区至少六年不改”。为了“民

改”进行的顺利，当局首先以开会、学习、参观等为名义，将绝大多数藏人政治和宗教领袖们先后召集并集中关押起来，他们当中几乎没有活着出来。中共通过拉拢、统战等手段争取过来一批以偷盗抢劫、不务正业的人为主体的“受反动头人和喇嘛压迫和剥削穷人”，任命他们为“革命干部”。继而，把个人和寺院的财产没收，设立党完全掌权的行政制度，对此引起了这些地区的藏人的普遍不满和反对。

按照“十七条协议”的“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和“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等条款，称做“西藏”的西藏中西部地区应该不会被强行改制。但是，中共政府现在不但在西藏东部的康区大部和安多地区实施“真正改”和“坚决改”的专制政策，而且以“西藏地区至少六年不改”为暗示，表面西藏中西部将被改制的日期也不远。很显然，眼看着中共政府逐渐在实施超出“十七条协议”有关条款的政策时，西藏中西部地区的藏人也随时处在会被“改革”的恐惧和不安之中。

1955年首先被中共政府进行“民改”的西藏地区是康区东部目前划入四川省的甘孜州和划入云



1956年起中国共产党政府曾多次出动轰炸机群，轰炸西藏康区的多座寺院和被定性为“叛匪”的藏人僧俗百姓。

南省的迪庆州境内。1956年时，中国政府强行改制的政策，使当地西藏百姓和中共当局矛盾白热

化。1956年2月15日，甘孜州色达县的诸部落在大首领仁真邓珠的率领下，举行反共武装起义，扬起了“维护西藏民族和西藏的宗教”的旗帜。百姓喊出“改革是中国人改西藏人”、“改革是消灭宗教”等口号，起义者围攻中共色达县政府。之后，



**“入藏平叛”的中国共产党军队
人数众多、武器精良。**

该州各县纷纷起义，反抗中共。中共中央《关于四川彝族和藏族地区反革命叛乱情况的通报》中所列的顺序为理塘、白玉、义敦、新龙、甘孜、巴塘、乡城、稻城、邓柯、炉霍等县。据陈国忠等人1956年2月17日给康定地委的电报称，当日已与仁真邓珠交火，一死二伤。据2月27日理塘工委致康定地委的急电称，下午四时理塘县城被包围，有人开始“向我射击”。接着，在划入青海省和甘肃省的康区西北部和安多地区强行“民改”，从1957年开始，这些地方的西藏人纷纷举行武装起义，抗议中共以欺骗的手段关押地方上的首领和宗教领袖、强占私人和寺院的财产、强迫藏人接受“民改”的政策。

1958年时，划入青、甘、川、滇四省的西藏地区已卷入战火中，交战的一方是拿着土枪和赶牛羊用的抛石器的藏人僧俗百姓，而另一方则是身经百战，并且拥有机枪、大炮、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应有尽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毛泽东还动用1953年斯大林送给他的10架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理塘、乡城、巴塘等地寺院，图-4飞机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秘密武器。1956年2月，轰炸理塘寺时，数千僧侣和平民被炸死。

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着手准备设立一个完全由中共控制的“西藏自治区”，全面取代名义上受“十七条协议”保障的噶厦政府。

1955年3月，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同年9月20日，在拉萨设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

不顾西藏绝大多数僧俗官民的反对，1956年4月，中共派陈毅元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设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4月22日，在拉萨大礼堂举行“中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任命”达赖喇嘛为主任委员、班禅喇嘛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秘书长。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并且“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

根据中共于1956年9月2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发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在西藏自治区未成立前过渡期间的协商筹划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本委员会以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等各方面的人员，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西藏地方政府等的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和中央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组成之。”

由此，显而易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把西藏噶厦政府编入中共体制内的“中央西藏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之中的第



**中共政府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
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

一步；“委任”达赖喇嘛为主任委员和班禅喇嘛为第一副主任，是为了平息西藏噶厦政府和僧俗百姓对中共设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满；同时，给外界一个错觉，即中共根据“十七条协议”仍然没有改变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教领袖的地位。这个由51人组成的筹委会中，真正掌握军政大权的是第二副主任委员张国华和排名在常委委员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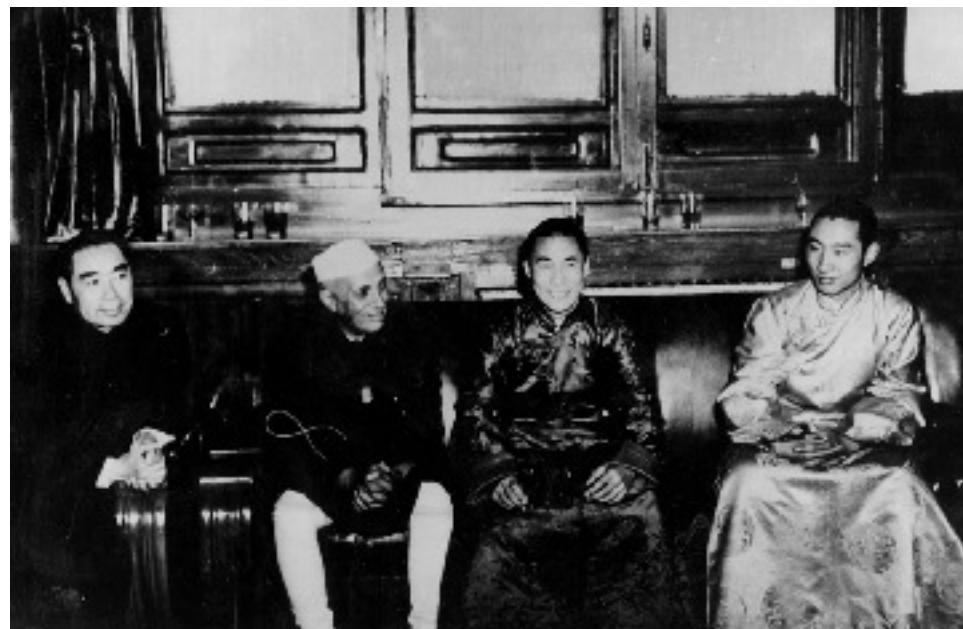
中的中共军官谭冠三、范明、王其梅、慕生忠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眼中，担任筹委会秘书长的阿沛·阿旺晋美是他们为实现全面统治西藏而玩弄的政治和军事游戏中的一个“过河小卒”。

当时，被任命为委员的其他藏人有赤江·罗桑益西、索康·旺清格勒、朵喀·彭措饶杰、先喀·居美多杰（夏苏）、噶章·洛桑日增、达拉·洛桑旦、柳霞·土登塔巴、凯墨·索南旺堆、宇妥·扎西顿珠、桑颇·才汪仁增、绒郎色·土登诺桑、帕拉·土登为登、欧协·土登桑却、郎林·班觉久美、敏林·嘉样坚赞、尧西·公保才旦、詹东·计晋美、拉敏·益喜楚臣、诺章·洛桑坚赞、纳旺金巴、德饶·多吉友甲、多旦·洛桑金巴、慈旦坚赞、洛桑称烈、团康·索南刀杰、帕巴拉、察雅·罗登协绕、邦达多吉、平措汪杰、格桑旺堆、思朗江村、才旺多吉、庞球、威萨坚赞（功德林扎萨）、阿曲、索朗、土登才仁（多娃堪苏）、伦珠讨凯、土登却吉坚赞、定吉活佛、萨迦·阿旺土钦班巴、楚普噶玛巴·日贝多吉、墨林·阿旺却扎、朗顿·贡噶旺久、雪康·土登尼玛、丹增嘉措、尧西·次仁卓玛。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从“无产阶级”中来的，除了平措汪杰是中共党员，是中共派来在18军里当文官的藏人以外，他们中有西藏噶厦政府的高层官员、宗教界高层喇嘛、贵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家人、大商人、被俘和投降的藏军军官、部落首领。他们都属于后来被中共政府划入“三大领主”或“三座大山”的“农奴主”阶级。很显然，中共方面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这些人在西藏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先在西藏中西部建立中共掌权的“西藏自治区”。这与中共在前些年，在划入川、青、滇、甘的各西藏地区建立中共的政权时，最初任命当地的部落首领、社区领导、寺院的活佛和堪布等担任“自治区”（后来改为“自治州”）、县等的主任、副主任、县长、副县长等职务的做法，同出一辙。

1956年，印度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到印

度参加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达赖喇嘛向中共在拉萨的范明将军通报此事。范以各种理由阻止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建议他派个代表去。四个月后，10月中旬的时候，范再次建议达赖喇嘛指定去印度的代表，达赖喇嘛就决定派他的一个导师去代表他。11月初，范又来见达赖喇嘛，才承认说10月1日中国政府已收到印度政府发来邀请他和班禅喇嘛当贵宾的电报，中国政府已对这件事的方方面面做了考虑，达赖喇嘛可以去印度只要他还想去。其实，从印度驻拉萨领事馆透露的消息，人人都已知道印度政府给达赖喇嘛发过邀请书。中共方面估计去印度的时间快到了，已拖到这



1956年达赖喇嘛尊者（右二）和班禅喇嘛（右一）

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二）

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左一）一起。

么晚了，达赖喇嘛不会去的，所以就说同意他去，但达赖喇嘛还是决定去。毛知道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后，11月15日，毛在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气愤地说，“这里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很显然，毛泽东最担心的问题是，达赖喇嘛去印度后不会来，而且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从这可以看到，尽管达赖

喇嘛在为说服西藏各界人士要与中共和睦相处而努力，并真心真意地在许多方面尽力与中共合作，但毛泽东和中共一方从来不信任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动身去印度之前，从北京匆匆返回拉萨的“中央代表”张经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前来见达赖喇嘛，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达赖喇嘛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依离藏之前已定的行程计划，前往朝拜印度的一些著名佛教圣地，这时，中共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贺龙也抵达印度访问。周在印度与达赖喇嘛先后会晤两次，为确保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对他进行宣传工作。周还专门请当时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共进晚餐。周恩来以发誓的口气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直到你和西藏人民希望并觉得改革的时候了，西藏绝对不搞改革。”为了再给中共政府一个遵守诺言的机会，尽力阻止西藏的政治情况继续恶化，达赖喇嘛决定尽快返回西藏。同时达赖喇嘛不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极力反对，应邀访问了噶伦堡的藏人社区，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达赖喇嘛去了那里，会受到当地“藏独分子”们的“鼓动”而动摇返回西藏的决定。当达赖喇嘛抵达噶伦堡时，旅居在那里的藏人各界人士请求达赖喇嘛不要返回西藏，但达赖喇嘛本着他一向做事不吃回头草的原则，谢绝他们并毅然返回西藏。

1956年，中共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



1956年8月，中共战机在西藏日喀则上空飞翔，西藏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恶化。

会上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当1957年4月，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时发现，大昭寺对

面的中方机构的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准备打仗。

到1958年时，西藏东部划入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等省的西藏东部和东北部的康区大部和安多地区的局势变的更加严峻，中共政府在这些地区不但加大了强搞“民主改革”和“合作化”的力度，而且调动大批军队到处进行“剿匪”。把这些“匪区”划成了“全叛区”和“半叛区”。划成“全



四水六岗西藏卫教志愿军总司令恩珠贡布扎西（中）与康巴勇士们在一起

叛区”的地方格杀勿论，不管男女老少。康区的玉树和安多的果洛等被定性为“全叛区”的地方，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成年男性被全部抓走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死于监狱。有些部落的所有人都被杀；有些地方的村庄和寺院遭军机轰炸。大量的藏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向西藏中西部地区逃难，几万难民拥挤在拉萨。从康区和安多地区逃难的藏人百姓四处遭受中共军队的围追堵截，有的被杀，有的被捕、有的冲出重围继续逃亡。

因为中共政府在西藏东部地区没收藏人的土地、牛羊等私有财产，强行“土改”，施行“合作社”、“公社化”、“大跃进”等极左政策，导致了1958年和1959年期间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吃死人的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中共同时进行的“剿匪”、“平叛”等武装镇压中，又有众多藏人被杀死，其中有参加反抗武装组织的青壮年男性藏人，也有手无寸铁，根本没有参加反抗组织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阿届阿固洛”（即五八、九年），在藏语中已成为指代“饥荒和战争双重灾难”的词语。

1958年6月16日，恩珠贡布扎西等在山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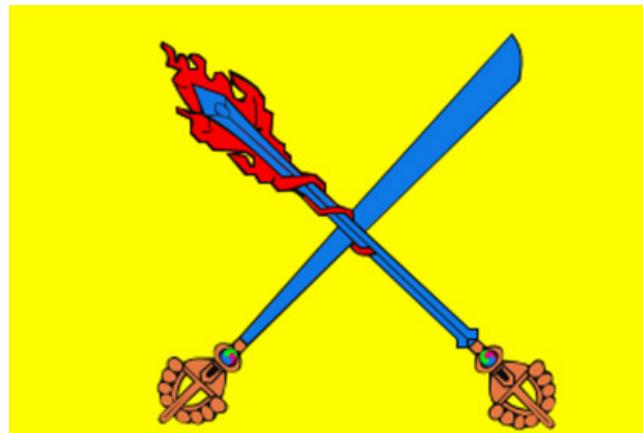
**西藏卫教志愿军总司令
恩珠贡布扎西 (1905-1964)**

的竹吉塘，正式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退至卫藏境内的在康区抗议中共的各路民间武装组织和逃难的康巴人是卫教军的主体，来自安多和卫藏地区的藏人也不断地加入卫教军。

西藏康区包括：今划入四川省的甘孜州、云南省的迪庆州、青海省的玉树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大部、林芝地区的一部分、四川凉山州的木里县、青海省海西州的一部分等地区等。西藏安多地区包括：今划入四川省的阿坝州、甘肃省的甘南州和天祝县、青海省的海西州大部、果洛州、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海东地区等。卫藏包括：今拉萨市下属的各县、山南地区、那曲地区的一部分、林芝地区的一部分、日喀则地区、阿里地区等。在传统上，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的西部一些县属于阿里三区。

来自康区和安多的反共人士和逃难者被中共统称为“叛匪”并成为“剿匪”的对象，其中有些人在中共军队的追杀下已逃亡3年。“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是一只反抗武装力量，自其成立之始，就受到中共军队的“围剿”。在山南和那曲境内，卫教志愿军与中共的“剿匪”大军发生多次交战。

当时，中共中央和西藏工委指示噶厦政府派藏军协助人民解放军歼灭“叛匪”，要求噶厦政府不能与“叛匪”有任何关系。为了与中方和平相处，也为了避免中方找借口在西藏中西部实施“民改”和更多的藏人被杀，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尽力在各



西藏卫教志愿军的军旗

方面不冒犯中共。到1959年3月时，中国军队“剿匪”的战火实际上烧到了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拉萨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大家都处在恐惧之中。因为几年来食物紧缺，粮价暴涨的结果，拉萨一带的民众中，家无口粮，饿死人的情况也日趋严重，致使拉萨全城被恐惧和饥荒的气氛笼罩。

九、炮轰古都拉萨，西藏政府流亡印度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受邀拟前往中共的“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但在3月9日，中藏双方安排相关事宜时，中方提出，达赖喇嘛到军区来时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携带武器的警卫，藏军不能过离中共军队司令部不远的那座桥。对此，心胸荡然的达赖喇嘛还是决定去，他觉得不带警卫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是，按照惯例，达赖喇嘛去哪里都有藏军护送，并有全副武装的警卫随身不离，中方也知道。所以当藏人听说，达赖喇嘛这次被邀请去中共军营，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觉得很不对劲，引起了他们对达赖喇嘛安全的担心，因为西藏康区和安多各地和部落中有影响力的首领和高僧大德都曾被通知和邀请去参加中共的宴会、看电影、开会、参观等，然后被关进监狱，而再没有回来。当时，成千上万从安多和康区各地逃难的藏人在拉萨，拉

萨人人都知道各个地区发生的这种事情。于是，大家觉得必须阻止达赖喇嘛去中共军营，这样，数万藏人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围住，恳求他不要前往中共的“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

最终达赖喇嘛决定不去中共军营，达赖喇嘛和



1959年3月10日，藏人民众围住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中共军营看演出。

噶厦政府要求包围罗布林卡的民众回家。民众不但不散，而且限制了噶厦官员进出罗布林卡的活动，他们对噶厦政府的懦弱感到失望。3月11日，藏人民众在布达拉宫脚下召开人民会议，要求中共军队和官员离开西藏返回中国。

3月11日，中共“西藏工委”向北京汇报有关拉萨发生的事件说，“据我们了解，截止10日下午，三大寺的喇嘛已有1400多人进入拉萨市区，原散布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在天黑后陆续小股（20至30人一股）向拉萨市区运动。估计加上藏军2500至3000人，现在拉萨的叛乱力量总共有6000至7000人。”中共中央当天回电指示说：“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充分。”中共中央还通知西藏工委：“中共中央正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平乱行动，要看形势发展才能决定”。

从中共西藏工委的汇报中可以看出，中共对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一直不信任。其实，3月10日拉萨发生的事件，是西藏僧俗民众为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而自发的集会。3月12日，几千名拉萨妇女在布达拉宫前集会，抗议中共侵占西藏。

拉萨的中共政府机关和军队都在加紧做开战前的准备工作，拉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3月

14日，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要求民众撤离罗布林卡，但是，藏人就是不愿散去，他们决定誓死保护达赖喇嘛，他们已经不听从噶厦政府官员的要求，大家认为西藏落到这个地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政府的软弱和官员们的腐败行为所致。

3月17日，中共军方向罗布林卡发射了两枚炮弹，一枚落在罗布林卡北墙外的沼泽地里，另一枚落在宫内的池塘里。情况十分危机，按西藏的惯例，罗布林卡请乃琼国家护法神降神，求他指明如何能保护好达赖喇嘛的安全和西藏佛教。按照乃琼护法神的旨意，当晚十点，达赖喇嘛装扮成一名普通卫兵，悄悄离开罗布林卡，踏上了去西藏南部避难的旅程。

3月20日黎明前，位于拉萨西郊的中共炮兵阵地向罗布林卡开炮，其中一枚炮弹擦过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居室——达丹明久颇章的屋顶并落在院子里，宫殿里窗户的玻璃都被震破。那时中共还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离开。早晨七点左右，中共军队从东门闯入罗布林卡。3月21日，布达拉宫和大召寺等一一遭到中共军队的炮轰并占领。

3月22日，北京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在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其中宣称，“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局势迫使



1959年3月17日，中共军队炮轰罗布林卡等地，拉萨城里浓烟四起。

我们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决战，进行一次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平息叛乱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在继续执行下去。”3月23日，西藏的中共军队发布报告，撤消原隶属西藏噶厦政府的拉萨市政府。3月28日，中共总理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噶厦政府，由新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政治权力”，任命十世班禅喇嘛为“筹委会主任”。

3月26日，达赖喇嘛和出走的噶厦政府的官员

抵达西藏南部的隆子宗。达赖喇嘛本想暂时住在隆子宗，把它当做西藏噶厦政府的临时驻地，与中方进行对话，使西藏的局势有所好转，然后返回拉萨。但中共军队已炮轰并占领了罗布林卡、布达拉



达赖喇嘛和随员在卫教志愿军康巴勇士们的护送下，前往印度的途中。

宫、大召寺等，甚至把噶厦政府所属的拉萨政府撤消。中共的做法已违背了“十七条协议的”有关条例。于是，达赖喇嘛也宣布“十七条协议”无效。噶厦政府通过讨论决定，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政府去印度避难，而且翌日动身。3月31日，达赖喇嘛和随行的噶厦官员抵达印度。

从进军西藏，强迫西藏政府代表在“十七条协议”上签字，炮轰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到“解散”西藏噶厦政府，在1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国际社会处在冷战的形势和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完成了占领并全面统治西藏的战略部署。对中共而言，西藏弄到手是一箭双雕的收获，为苏俄领导的红色阵线扩展了势力，得到了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最重要的还是将中共的“国土”增大了近250万平方公里。对西藏噶厦政府而言，它没能尽到一个国家政权保卫自己国土的职责。对西藏人民而言，开始了真正被殖民的政治灾难。

十、全面赤化西藏

1959年3月底，中共公开宣告“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之后，在中共“西藏军区”的管控下，此前受“十七条协议”“保障”的西藏中西部地区，全面开始了“土改”、“大跃进”、“合作化”和“公社化”等共产党专制的运动，中共为了使自己在西藏进行的赤化政策合理化，把西藏原来的社会制度定性为“半封建半奴隶

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从1959年至1962年，中共的“大跃进”政策给整个西藏三区造成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饥荒，导致大量的藏人饿死。1962年，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建委员会代主任”的班禅喇嘛写了一篇长篇报告，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叙述西藏三区的社会状况。“在西藏各地饿死了许多人，在有些地方全家人都死了，死亡率非常高。这是极为反常、恐怖、悲惨。”他在报告中指出：“过去，西藏处在黑暗野蛮的封建社会里，但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饥荒。在西藏，从1959年到1961年，两年当中，畜牧业和农业生产都几乎被停业。老百姓没有粮食、肉、酥油和盐可食。”班禅喇嘛报告中指出，西藏饿死这么多人，是中共政府的政策所导致的，而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据幸存下来的有些老人的回忆，在合作社里，每天都饿死好多人，当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吃过死人的肉，这是西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悲剧。班禅喇嘛在1962年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写的这份长篇报告，后来被称为《七万言书》。

从1966年到1979年，在中国和西藏，宗教信仰活动被彻底禁止，众多西藏佛教的高僧大德惨遭监

國務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決定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
在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期間，由班禪額爾德尼代理主任委員
撤銷叛國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十八人的自治區籌委會委員和一切職務，并按國家法律分別給予懲
戒和上層反動地主階級頭目。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將根據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結合本地
方實際情況，採取有效措施，逐步實現西藏的民主化、社會主義化、民族平等化。各族人民團結一致，
共同努力，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新西藏而奮鬥。

**中共政府的媒体上有关中国国务院
“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的报道**

禁、批斗和杀害。

西藏境内的大部分寺院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遭到毁坏。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写道：“民改掀起了一个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



十世班禅喇嘛在1964年被中共当局打成“叛国分子”、“三反分子”，遭批斗。

墙、佛塔进行了疯魔闯入般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而且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画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他指出：“僧俗人民宗教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趋于消灭、中断，而严重至极的情况：要把房顶的经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护身符和‘金刚结’；家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也要藏起来，不敢公开念经积善，不敢烧柏香敬菩萨，对圣地和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养，转经和供养‘善僧’，布施穷人等积德行善之事都不便或无法进行，形成病不念经，亡不超渡等。比如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渡，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期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死的早一点，还能得到祈祷超渡，现在死就象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仅仅从这悲惨之叹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还指出：“我在去年一九六一年向总理您曾经报告过的：‘西藏过去只有信教的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从民改以来有充分的不信教的自由，没有信教的自由或者仅有点影子。’这种陈述肯定与西藏实际发生的情况符合无错的。因此，党允许信教自由的正确政

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明文规定在我们藏族地区只执行了一半，这是违背党的正确政策和国家的宪法的严重行为。”

毛泽东在看到《七万言书》后，把它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

1963年全年到1964年初，班禅喇嘛遭隔离关押。1964年藏历新年期间，班禅喇嘛在拉萨的祈祷大法会上，对参加法会的一万藏人讲话，提出西藏有权独立并号召西藏独立，支持并赞扬了达赖喇嘛，称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领袖，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当场遭拘禁。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十世班禅喇嘛受到严厉批判，被指控“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批判班禅喇嘛是“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和“班禅叛国集团总头目”，指控他阴谋“背叛祖国”，搞“西藏独立”，但是，班禅喇嘛据理力争，毫不妥协，为此，他获罪“态度恶劣”、“抗



1965年9月1日中共政府设立“西藏自治区”并在拉萨召开“第一次人代会”

拒改造”。在会议期间，十世班禅的家被抄，查出的经文被称为是“向党进攻”、“诅咒共产党、诅咒毛主席”的罪证。

1965年9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代表中共中央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时，讲话中批判十世班禅喇嘛说：“达赖叛国以后，班禅代表西藏已经被打倒了的农奴主阶级，组织反革命集团，猖狂地进行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去年，西藏人民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揭



被中共当局任命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第一次人代会”上讲话

露和批判了班禅集团的罪行。这是西藏平叛改革以来，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之间的一次尖锐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这一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民主革命胜利成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具有重大意义。班禅的罪恶是很严重的。但是，党和人民还是给了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能悔罪自新，重新做人。党和人民给了他宽大的处理，他是否痛下决心改造自己，那只有看他自己了。”

1965年9月1日，中共宣告成立“西藏自治区”，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张国华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为副主席。

“西藏自治区”的设立，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共最初入侵西藏时的既定政策的实现。从此，在西藏最高的掌权者是“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历任党委书记都是北京直接派来的汉人，没有一个藏人被任命为“自治区”党委书记。为了向外界显示，西藏享有“充分的民族自治权”，中共当局通常任命一些藏人，担任“自治区主席”、“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没有实权的职位。

中共在“西藏自治区”历任党委书记

张国华（1965.09-文革初期）、任荣（1971.08-1980.03）、阴法唐（1980.03-1985.06）、伍精华（1985.06-1988.12）、锦涛胡（1988.12-1992.11）、陈奎元（1992.11-2000.09）、郭金龙（2000.09-2004.12）、杨传堂（2004.12-2005.11）、张庆黎（2005.11-2006.05 代书记）、张庆黎（2006.05-2011.08）、陈全国（2011.08-）

中共在“西藏自治区”历任政府主席

阿沛·阿旺晋美（1966.09-文革初期）、曾雍雅（1968.09-1970.11）、任荣（1970.11-1979.08）、天宝（1979.08-1981.04）、阿沛·阿旺晋美（1981.04-1983.05）、多杰才旦（1983.05-1985.12）、多吉才让（1985.12-1986.05，代主席）、多吉才让（1986.05-1990.05）、江村罗布（1990.05-1998.05）、列确（1998.05-2003.05）、向巴平措（2003.05-2010）、白玛赤林（2010.01-2012.12）、洛桑江村（2012.12-）



主要参考书

《和平解放西藏》，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

《西藏平叛纪实》，吉柚权（著），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3年；
《雪域境外流亡记》，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慧炬出版社，台北，1991年；
《七万言》，十世班禅喇嘛（著），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达兰萨拉，1998年；
《西藏历史地位辩》，王贵等（著），民族出版社，北京，1997年；
《西藏记忆》，唯色，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
《西藏的地位》，迈克尔C范普拉赫（著），噶玛默朗（藏译），达瓦才仁（根据藏译本翻译成中文），雪域出版社，台北，民国100年；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
《1959年 拉萨！》，李江琳（著），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香港，2010年；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全书在网上）；
My Land and My People, by 14th Dalai Lama, Warner Books, New York, 1997;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31-1951, by Melvyn C. Goldst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9;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by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04;
60 Years of Chinese Misrule: Arguing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by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Washington, 2011;
Dalai Lama, My Son: A Mother's Story, by Diki Tsering, Penguin Group, New York, 2000;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by Thomas Laird, Grove Press, New York, 2006;
Demystifying Tibet, by Lee Feigon, Elephant Paperbacks, Chicago, 1996;

编者的话

由于中共政府长期贯彻执行唯有“党的思想和教导”为正确的政治原则，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有关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也基本上是在“党的教导”下形成的。几十年来，“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达赖喇嘛分裂主义集团想恢复西藏的旧制度”、“党的光辉下百万农奴当家作主”等等，极端的政治宣传品成为中国政府一贯用来树立中国民众对西藏的意识形态，因此绝大多数大陆的中国同胞从来没有机会去了解过去五十年里西藏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和西藏人民的心愿，更无法知道西藏问题和西藏自由运动的本质和其历史特性。

《了望西藏》的宗旨是为提高华人和中文界人士对西藏及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力求为海内外的华人和藏人之间提供交换观点的论坛和传播信息的空间。

《了望西藏》希望广大华人和藏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并共同探索互利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

《了望西藏》力求客观、真实地向读者提供有关西藏问题及西藏运动的综合信息。欢迎您向我们寄来您的观点和意见。

只要您向下列地址寄来您的邮寄地址，我们将给您免费赠送《了望西藏》刊物。

Editor: Rinchen Tashi
Liaowang Xizang
1825 Jefferson Place, NW
Washington, D.C. 20036
USA



ICT United States
1825 Jefferson Place, NW
Washington, DC 20036
USA
info@savetibet.org
www.savetibet.org



ICT Europe
Vijzelstraat 77
1017 HG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icteurope@savetibet.org
www.savetibet.org



ICT Deutschland e.V.
Schonhauser Allee 163
10435 Berlin
Germany
info@savetibet.de
www.savetibet.org



ICT Brussels
11, rue de la liniere
1060 Brussels
Belgium
ict-eu@savetibet.org
www.savetibet.org